

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

卞崇道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

王中江 著

王中江 著



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

卞崇道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长春)

(吉)新登字 01 号

EL42/15

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

卞崇道 著

王景海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1 印张 260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 7-206-02520-4

B·68 定价:18.00 元

序

日本,是我们熟悉而又不完全熟悉的邻邦岛国。在本世纪上半叶,它曾因发动野蛮的对外侵略战争而引起世人的责难与怨恨;在本世纪下半叶,它又以魔法般的高速度恢复与发展经济,成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非欧国家,从而再一次令人刮目相看。由于这两次冲击宛如日本海突起的台风,来得十分凶猛,因此它给人们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同时也引来世界上众多的学人把目光投向日本,泼墨弄笔,尝试着为 20 世纪荣辱相伴的日本史作出自己的诠释。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 世纪的日本哲学与文化又是怎样谱写自己的历史的呢?它在自己脸上刻下的印记是“荣”还是“辱”呢?这正是我——熙来攘往的日本学学者大军中的无名晚辈——所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20 世纪的日本哲学与文化亦即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它形成于本世纪初叶,展开于二三十年代,沉滞于 40 年代前后的战争时期;战后即本世纪后半叶,又在反省战前、战时的哲学与文化的基础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展现了新的姿容。诚如本书题名《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所示,我所论述的对象显然是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但内容却不是关于现代日本哲学史或文化史的全面的系统的描述,而只是对笔者认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愚见的陈述。因为关于日本哲学史迄今已有不少前辈学者和同仁推出了多部优秀著作,我个人也曾与王守华教授共同编著了《日本哲学史教程》(1989),尔后又主编了《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1996),这些都是关于日本哲学史的比较成体系的著书。自成体系的著作有优点,也有不足。其不足之处,就是在固定结构的框架内,对一些重要问题不能展开深入的、详细的探讨。我之所以刊出这本拙著,目的就是想弥补上述不足,对在上著中想说而又未能尽言的一些问题(不是所有的问题)再作些讨论。因此,本书的特点不在于追求

体系的建构,而在于提出独自の见地。有些观点,也仅止于提出,尚未来得及深入展开。我想若能把本书与上述两书结合起来阅读,则必将对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获得较为完整的印象。

在本书上编“现代日本哲学”中,我想着重提出的一个看法,是现代日本哲学形成于本世纪初,其标志是西田几多郎处女作《善的研究》(1911)的出版;西田哲学既是近代日本哲学(明治哲学)发展的顶峰,又是现代日本哲学的开端。西田哲学形成、展开、终结的历史时期适逢本世纪上半叶,即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先后占据世界哲学主潮流地位的时代;西田在展开独自の哲学思索的全过程中,始终以开放式的思维关注着世界哲学的动向,并且在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中,捕捉和解答现代哲学的课题,从而把自己的哲学思索不断引向深入。可以说,西田哲学也是现代世界哲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本世纪后半叶即西田几多郎故去的战后时期,西田哲学尽管受到过严厉的批判,但是,它不仅没有伴随西田本人的逝去而退出日本哲学历史的舞台,相反,它依然是战后日本哲学的基石和支柱。现代日本著名哲学家三木清在日本败战前就指出:“假若不从根本上批判与超越西田哲学的话,就不会产生将来日本的新哲学。这既是困难的课题,又是重要的课题。”这是三木清留给战后日本哲学界的重要遗言(三木清于1945年9月26日死于狱中),尽管迄今这个课题尚未完成,但是,一些抱有创造性意欲的哲学家最终都把西田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试图通过批判与超越西田哲学来建构独自の哲学体系,探索日本新哲学的途径。总之,不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西田哲学都是现代日本哲学的中枢。可以说,没有西田哲学,也就无所谓现代日本哲学。

在现代日本哲学发展中,如果说以西田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占据主流地位的话,那么,作为非主流哲学存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容忽视。本书选取两个典型——河上肇与广松涉加以论述,前者是败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后者

是战后时期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上下求索的皎皎者。两人代表着日本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走着一条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共同道路。此外,还有一点发人深思的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都包含有不同程度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河上肇一生孜孜不倦地向着马克思主义真理攀登,并且最终也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样,在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同时,他又始终不放弃“宗教真理”,他是一名抱有双重真理观的马克思主义者。广松涉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考证与研究,越过前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直接切入马恩本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接触到了马恩思想的真缔。进而他以“事的世界观”为基础,建构“广松哲学”,试图以之在理论上超越近代哲学,在实践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可是,他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一步时,却有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并且最终也未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途径。在河上肇和广松涉身上之所以会产生和保存着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共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他们所处时代的世界性文化潮流息息相关。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就是在德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并且得到发展的。继马、恩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与发展中培育出数不胜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面孔都是多种多样的,在他们身上无不打上各自民族文化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不仅是正常现象,而且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表现。河上肇与广松涉是作为特定的东方国家日本的知识分子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然而作为典型他们又具有超越日本国境的普遍意义。

在本书下编“现代日本文化哲学”中,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日本文化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上。关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及其特质,日本学者已有众多的研究,本书首先对他们的研究作了介绍和评论,旨在使我们对日本文化以及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有所了解。无

疑,日本学者丰富多彩的日本文化论,最终都归结到“日本人的立场”这一点上。作为中国学者,自然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看待日本文化的。在世界尚未成为“全球村”的今天,尽管我们要培养自己作为“全球人”的意识,但超脱国界与民族文化的所谓超然的立场是不可能存在的。我认为,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多元性。这里的多元性,不仅指各个历史时代日本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多元并存”的文化现象,而且指作为日本文化之根源的源头的多样性。也就是说,从扎根于地下的根干到生长于地上的枝叶,都表现出日本文化的多元主义特征。这种说法类似于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但是,加藤没有进一步揭示西方文化之种与日本文化之种是如何在日本这块土壤上形成统一的一棵“日本文化大树”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本书中提出“嫁接论”的设想,即古代日本文化是在与中国文明的嫁接中形成与发展的;自近世起,特别是明治时代初期,日本文化又通过与近代西方文明的嫁接,完成了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形成了现代日本文化。在这里,日本文化从诞生伊始,就是通过与外域文化因素的嫁接实现其融合与更新的。因此,日本文化结构呈现重层结构型,即日本本土文化不断迭加外来文化;在日本文化中的旧文化之上不断迭加新文化。结构的重层性决定了结构内部力的多向性,这种多向性力的对立统一就是文化活力,也就是文化的生命力。正因为日本文化在其源头上就是多元的,是通过“嫁接”或曰“杂交”形成的,所以它没有坚固的本土文化的传统性,在新旧时代转换时期,它易于转型,这也是日本文化较之中国文化易于完成自身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在论及日本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时,本书提出,日本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突破了欧美现代化的现成模式,也就是打破了西方文化价值中心主义的神话,创造了具有日本民族和文化特色的综合型现代化模式。日本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不同于欧美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其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而最具日本特色的

要素莫过于“脱亚入欧”。由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福泽为日本现代化设定了目标，即要把日本建成与欧洲诸国具有同等文明程度的现代国家；另一方面，他的“脱亚论”是在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亚洲各国的前提下，旨在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亚洲秩序，即谋取亚洲支配者的地位。“脱亚入欧”理论在文化上表现为割断与排斥传统，甚至否定与抛弃传统。实际上，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不是单纯“脱亚入欧”的产物，也不是日本传统思想在现代的翻版，而是东西方文化融合所产生的独特的现代日本的民族精神。作为该民族精神之精髓的日本近现代哲学，是伴随日本现代化而产生、发展并为其服务的。可见，哲学如果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时代，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

总之，我在本书中力求明确地表述自己对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的一些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显得很肤浅，不成熟，甚或是谬误，但是，要想深化自己的研究，就得敢于推陈出新，大胆亮明自己的观点，从而引起他人的关注、批评和争论。他人有益的批评和批判，才是提高自身学术水平最强劲的动力。我期盼着在我国日本哲学乃至日本学研究界形成健康的学术争鸣的氛围，以推动我国日本学研究健康、深入的发展。同时，我更希冀学界前辈、同仁和广大读者对拙著提出批评，以为我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和营养。

目 录

上编 现代日本哲学

第一章 西田几多郎与现代日本哲学	(2)
第一节 现代日本哲学的形成	
——以《善的研究》为中心	(2)
第二节 西田哲学与现代日本哲学	(22)
第二章 求道者的艰辛攀登——河上肇论	(41)
第一节 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攀登	(42)
第二节 河上肇的哲学思想	(50)
第三节 河上肇与中国革命	(67)
第三章 广松涉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	(71)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研究	(72)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	(76)
第三节 广松哲学的建构——以关系主义本体论为基础 ...	(81)

下编 现代日本文化哲学

第四章 现代日本文化哲学的历程	(103)
-----------------------	-------

第一节 昭和前期日本的文化哲学·····	(103)
第二节 战后时期的日本文化论·····	(115)
第五章 日本现代化中的文化问题·····	(139)
第一节 从“脱亚入欧”到“重新入亚”·····	(139)
第二节 日本文化的现代化·····	(151)
第六章 日本现代化与日本哲学·····	(174)
第一节 日本现代化的提出与近现代日本哲学·····	(174)
第二节 日本现代化与哲学研究的课题·····	(185)

编外篇 现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

第一篇 日本哲学研究四十年·····	(206)
第二篇 90年代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课题 ·····	(240)
第三篇 战后日本哲学与中国·····	(251)
附录：	
一、战后日本思想界关于近现代日本哲学研究综述 ·····	(260)
二、书评一束 ·····	(294)
三、访日札记 ·····	(315)
后 记·····	(341)

现代日本哲学

现代日本哲学始于何时?中日学术界并无定论,且对此问题并不关心。其原因,一是由于日本哲学史的断代分期只具形式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二是由于中日学者对于“近代”与“现代”这一用语的涵义在理解上不尽相同所致。日本学术界在划分日本历史时期时,一般都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和现代五个时期。中国学者则多把古代、中世与近世统称为古代,从而把日本史区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

关于日本哲学史,中国学者一般多依据对于日本史的分期而把日本哲学史区分为古代、近代与现代三个阶段。在日本,由于学界把哲学理解或限定为 *Philosophia*,认为日本哲学始于西方哲学的移入(近世开始),从而把始于明治时代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日本哲学称为“近代日本哲学史”,把战后哲学称为“现代日本哲学”或“战后日本哲学”。

一般说来,东方哲学发展史大体可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四个断代。其中关于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所指,东方各国相差不大。然而,若从世界哲学史的视角,尤其从哲学史本身的规律来看,日本近现代哲学难解难分。我暂且提出这样一个设定,即把明治哲学规定为近代日本哲学,把始于大正时代至今即本世纪的哲学规定为现代日本哲学。

第一章 西田几多郎与现代日本哲学

西田几多郎(1870—1945)是日本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溶东西方思想于一炉,成为独具特色的日本型哲学。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西田哲学都兼取了东西之长,既承袭了日本传统思想,又有现代哲学的明显特征,在其思想底流,甚至与现代世界哲学诸流派同源同流。西田遵循井上哲次郎、大西祝等人开创的学院派哲学,但又远远超越其上,形成了具有独特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的哲学体系。1926年,左右田喜一郎第一次标出“西田哲学”以来,一跃成为日本最初的独创的及世界的哲学。西田哲学的诞生既标志着现代日本哲学的开始,又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日本哲学的发展。

第一节 西田哲学的形成

——以《善的研究》为中心

一、“明治青年”西田几多郎

西田几多郎生于明治新政府刚刚建立三年的1870年,至1911年(明治44年)出版处女作《善的研究》(时年42岁),可以说,他的孩提时代、学生时代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明治时代(1868—1912)渡过的。明治时代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转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是充满着亢进与挫折、谦卑与傲慢、理智与愚妄的时代,这种时代氛围给予成长期的明治青年西田几多郎以深刻的影响。

(一)从小学到“四高”时代(1875—1890)

西田几多郎故里石川县河北郡宇气町,是濒临日本海的一个滨海小村,西田家是祖居这里的一户大地主。明治3年9月“藩籍奉还”之后,其父西田得登担任村长;明治8年创立村小学,暂借西田家的长乐寺为校舍,得登兼营学校,几多郎虽未滿学齡,也因之得以入学。由于几多郎资质聪颖,且受尊重学问的家风影响,小学期间他的成绩一贯优秀,常受表彰。

几多郎自小学起便怀有强烈的求知欲,憧憬学问。1882年小学毕业后他的求学热望受到了第一次打击,这就是其父不允许他去金泽上中学。实际上,能登并非反对儿子学习,而是因为几多郎是长子,担心他外出念书之后不再归村继承其地主家业。经母亲和在金泽女子师范学校念书的姐姐的劝说,父亲同意几多郎上师范学校,以期将来回村当小学教师。1883年7月,几多郎考入石川县师范学校,同年全家也迁入金泽市。就是这一年,几多郎大姐尚因病死去,这使几多郎第一次品尝了生离死别之苦。几多郎入学仅一年多,便因病休学一年,并且趁机退学了。在校时间虽短,几多郎在认识上却获得一次飞跃。即明治初期文明开化之风也吹到了“充满封建臭气”的“城下町”——金泽,西田几多郎通过学习数学、英语等新知识和耳闻目睹,在脑海中渐渐展开了一个新的文化与学问的世界。过去,西田心目中的学者就是小学教师那样的人,现在他感到小学教师与学者不是一回事,师范学校不是培养学者的地方,他因此而决定退学。

经过一个时期的自学,几多郎于1886年9月作为补缺被编入石川县专门学校初中科第二级,这所学校原是藩校,不受明治政府约束,充满着自由的空气。就整个社会而言,明治19年前后是日本欧化主义达到顶点的时期(以“鹿鸣馆”为象征),自由主义思潮自然也波及到石川县专门学校。尤其是这所学校以学习外语为主要目的,因此,摄取西欧近代文化,成为学生们巨大的学习动力源。在

充满着新时代气息的这所学校里,几多郎贪婪地学习新文化和科学知识,梦幻般地憧憬着未来,同时立志成为承担新时代大任的学者。

时隔一年,明治政府下达新的教育令,石川县专门学校于1897年9月改称为第四高等中学校(略称“四高”,相当于中国的高中),直属文部省(即中央政府教育部)管辖。新的教育政策要求确立以适应国家秩序需要为教育目的的学校制度,从而为尔后的国家主义教育打下了基础。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改为国立的四高校风骤变,即由充满自由、亲情的学校变为循规蹈矩的“武断的学校”。对于血气方刚,豪放不羁的青年几多郎来说,强烈不满当局新的教育方针,缕缕缺课,犯规,以至于在公布“明治宪法”的日子里,他和一些人“举着顶天立地自由人的字版照像”。^① 1889年7月,他因“行为不轨”而受到处分成为留级生。可他不屈服于校方压力,终于在第二年从四高中途退学,决定自学。他认为,与其受学校约束,不如居家自由读书,“什么事情都要以独立独行去开辟新途。”^②

显然,在这个时期几多郎身上折射出的正是时代的影子。我们知道,明治政府确立的国家体制是保守的天皇制国家体制,作为加强这种国家秩序之一环的学校教育,也从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转而实施国家主义政策。几多郎留级和退学,也可以说是与这一教育政策发生冲突并予以反抗的结果。从中也可以看到他抗拒权力的压制,坚守文化自由与人格独立的个性特征,这也是许多进步的明治青年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

(二)选科生的冷遇与哲学志向的抉择(1891—1894)

从四高退学后,未及一年,西田几多郎因患眼疾被禁读书,加之父亲事业失败,家业濒于破产。这些不幸集于一身,使他的“独立独行”、“向往学问”的条件随之消失。然而在几多郎看来,家庭的不

① 《西田几多郎全集》第12卷第248页。

② 同上书,第248页。

幸犹如浮云,要超越云的浮沉,追求皓月当空的“真实”世界,唯有学问一途。现在追求学问的条件没有了,这在精神上使几多郎陷入悲痛。知子莫如母。几多郎的母亲深知儿子的心愿,并且坚信儿子一定能做出学问。因此,她千方百计筹措一点钱,带着儿子上东京,劝他“屈节”应考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选科。1891年(明治24年)9月,几多郎进入该校哲学科。

进入选科后,几多郎倍尝作为选科生的失望和屈辱。选科生待遇很差,没有到图书馆阅览室读书的自由,没有进书库自由检阅图书的权力。他回忆说:“当时的选科生实在是惨”,这样下去,“以后可能变成睁眼睛”,“较诸不久前还是一起的四高学生,我忽然置于如此悬殊的待遇下,感伤之心油然而起。在一隅之地渺小地度过了三年之久”,“总感到似乎已成了人生的落伍者。”^①学生时代坎坷接踵发生,给予几多郎以沉重的精神打击,以至于感到前途暗淡无光。但是,挫折和屈辱并没有使他丧失“独立独行”的精神,他遵循儒家文化的“克己”之路,重新振奋起来,专念于求知。

如上所述,西田几多郎上京考取的是东大哲学科选科。他为什么要选择哲学科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在四高时就已基本确定了。1888年,当他读完预科升入四高时,就曾面临着抉择未来事业的问题,即是进理科班呢,还是进文科班呢?他在后来回忆当时的困惑时说:“对于我来说,四高也是必须决定将来专业的时期。许多青年也和我一样,曾为此问题所困惑,是学数学,还学哲学呢?这尤其是我难以抉择的问题。某位尊敬的先生劝说我学数学:哲学不仅需要逻辑思维能力,还要有诗人般的想象力,不知你是否有那样的能力。这当然很在理,我也没有否定它的自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把一生付诸枯燥无味的数学的心愿。虽然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哲学专业”。^②根据当时学制的规定,

① 《西田几多郎全集》第12卷第242页、170页。

② 同上书,第169—170页。

在高中学习什么决定了将来报考大学的学科。他的恩师、数学家北条时敬高度评价他的数学才能,期待着把他培养成为数学家。几多郎自己本身也曾打算向北条学习,将来当一名数学家。

使几多郎对哲学发生兴趣的触媒是什么呢?许多资料表明,这个触媒就是井上圆了的著作《哲学一夕话》。井上圆了(1858—1919)是明治时代著名哲学家。1885年他从东京大学哲学科毕业,1886年至1887年便出版了颇具影响的著作《哲学一夕话》。此时,几多郎正在四高预科读书,他读了《哲学一夕话》之后,放下了数学而产生了学哲学的念头。关于这一点,西田后来的弟子高坂正显在《西田几多郎先生的生涯与思想》一书中说:“假若要问先生(指西田——笔者)读过哪些哲学家的书的话,先生曾回答:‘读过井上圆了的《哲学一夕话》。当然你们不会知道,读了此书深受感动’”。^①1888年升入四高一年级后,他便开始自由地贪婪地阅读哲学著作。除读了当时风行的穆勒、斯宾塞的著作之外,他还读了英译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明治时代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的《理学钩玄》(1886)等哲学著作。对于抱有进步思想、追求上进的高中学生来说,读了这些哲学著作,使他增强了弄清“顶天立地自由人”的思想根据,即“探究宇宙间真理”的决心。从这个时期几多郎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曾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并且此时的唯物主义倾向是与无神论的、反宗教的倾向相结合,无疑这是受到中江兆民《理学钩玄》的影响所致。

不过,对于尚处在成长期的青年几多郎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是什呢?他在当时写给山本良吉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锦衣玉帛似浮云,人生百事伪乎真”。显然,西田几多郎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在明治初期文明开化政策引导下,人们疯狂般地吸取西

^① 高坂正显《西田几多郎先生的生涯与思想》第17页。